

# 陳舜臣文學當中的台灣

## —以 1960-80 年代的作品為主軸—

笹沼俊曉

### 摘要

陳舜臣，本籍台灣新莊，是二戰後活躍於日本，最富影響力的推理小說及歷史小說的作家之一。1961年，其長篇推理小說《枯草之根》獲得江戶川亂步文學獎，之後陸續發表諸多推理小說；1967年，長篇歷史小說《鴉片戰爭》出版後，創作活動的重心逐漸轉為歷史小說，撰寫無數以中國大陸等亞洲各地區為舞台的歷史小說。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評論家或研究者深入探討陳舜臣文學的出發點與二戰後日本的華僑、華人、台灣人社會的關聯性。然而，於日本文壇登場後，作為在日台灣人的出身背景始終從各個層面影響著陳舜臣的創作活動。1960至80年代間，他以中國為題材的歷史、推理小說裡，將台灣形塑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所不可欠缺的地區。當時的他比較支持中共，字裡行間卻始終迴避，基本上不提兩岸、國共對立的相關議題。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他，為避免被國民政府檢視，且在日本華僑社會中引起政治對立，試圖將筆下包含台灣的中國寫成超越冷戰政治論述的土地。

關鍵詞：陳舜臣、在日台灣人、二二八事件、民族國家、冷戰

## 一、前言

2015年，作家陳舜臣（1924-2015）在日本神戶過世。大陸媒體以「日籍華人作家」，台灣媒體以「台裔日籍作家」等稱呼報導資訊。眾所周知，解嚴後台灣流行研究台灣文學，1990年代以後日本學術界也開始關心台灣、朝鮮等舊殖民地作家的「日本語文學」。陳舜臣是以台灣為籍貫的日文作家，但在台灣、大陸、日本等地學術界關注他的人並不多。

其實，陳舜臣是戰後日本大眾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發表了為數眾多以中國大陸等亞洲諸地域為舞台的推理、歷史小說，為日本大眾塑造戰後的中國形象，獲得廣大讀者層的支持。戰後在日本，武田泰淳、堀田善衛、井上靖、司馬遼太郎、山崎豐子、宮城谷昌光、北方謙三等日文作家都曾發表以中國為題材的歷史、現代小說，但唯有陳舜臣——一個在神戶出生長大的「華僑」——從在日弱勢族群的視角孕育獨特的作品群。其中，以台灣為局部背景，書寫台灣人在異鄉尋求自我認同即是陳舜臣文學的核心題目之一。由於他的創作活動，始於1960年代終於2010年代，足足橫跨了半個世紀，從而，探討陳舜臣文學，能作為了解戰後在日台裔華僑處境的一種手段。

至今為止，如上所述，研究陳舜臣文學的人並不多，幾乎沒有人探討其作品中的台灣要素為何。在日本，古代中國史研究者稻畑耕一郎著有專書《境域を越えて 私の陳舜臣論ノート》（東京：創元社，2007）評論陳舜臣；在中國大陸，曹志偉的《陳舜臣的文學世界——獨步日本文壇的華裔作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整理生平背景、作品概略等有關陳舜臣的基本資訊。不過，這兩本書雖然重視「華僑」作家陳舜臣的國際性、越境性，但並不關切其作為在日台灣人的這個面向，也沒有考慮到戰後日本社會以及在日台灣人所面臨的歷史處境。<sup>1</sup>

戰後留居日本的華僑並非是一塊岩石般的單一團體。尤其是那些做過「皇國臣民」，直接或間接接觸二二八事件且被國民黨當局監視的在日台灣人，其生命經驗和其他的日本華僑不同，其國族認同也不是那麼單純。陳舜臣的畢生大作是《中國の歴史 一～一五》（東京，平凡社，1980-1983）、《中國の歴史 近・現代篇，一～四》（東京，平凡社，1986-1991），他的歷史小說大多在描寫中國大陸另一方面也一直強調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因此他經常被認為是「中國人作家」。然而，無論其作品中有沒有直接出現台灣和台灣人，陳舜臣文學的背後仍存有在日台灣人的特殊歷史經驗。不關注台灣要素，不能了解他的文學世界。

我想在此探討陳舜臣文學如何描寫台灣和台灣人的形象，以及作品背景所呈現的戰後日本社會、政治、思想脈絡。但由於陳舜臣的小說、散文數量龐大，在此無法一一論述。本論文以《枯草之根》、《憤怒的菩薩》、《鴉片戰爭》、《殘絲之曲》、《桃花流水》等 1960-80 年代發表的作品為主軸，探討陳舜臣的文學世界當中的台灣形象。

通過作為戰後日本的弱勢族群之歷史經驗，陳舜臣如何建立文學世界？對他而言，「台灣」到底是什麼？本論文透過這些問題的探討，局部反思戰後亞洲文學、思想史。

## 二、初期作品和左傾華僑

首先，簡要敘述陳舜臣的來歷。1924 年他在日本神戶出生，祖籍是福建泉州，原籍是台灣新莊。在陳舜臣出生的前一年，全家移居神戶經營貿易公司。幼時祖父教他誦讀三字經、詩經、小學等傳統漢籍，學校暑假、寒假時父親會帶他回台灣。1943 年自大阪外國語學校印度語學科畢業後，在西南亞西亞語研究所當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國籍改變，不能繼續留校，回台灣新莊在台北縣立初級中學校擔任英語教師；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於 1949 年返回日本，在父親的貿易公司工作。

1961 年，長篇推理小說《枯草之根》獲得江戶川亂步文學獎，之後陸續發表《三色之家》（1962）、《割破》（1962）、《憤怒的菩薩》（1962）、《虹之舞台》（1973）等多部推理小說。1967 年，出版長篇歷史小說《鴉片戰爭》後，創作活動的重心逐漸轉向歷史小說，撰寫《旋風兒 小說鄭成功》（1977）、《太平天國》（1982）、《戰國海商傳》（1990）、《山河在》（1999）等以中國大陸等亞洲各地區為舞台的歷史小說。1993 年，NHK 台以其原創著作《琉球之風》（1992）為本拍攝大河歷史劇。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1973 年陳舜臣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但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他公開聲明放棄它，改入日本國籍。但此後他仍保有中華民國國籍。

陳舜臣有許多推理小說以中國大陸或日本神戶為舞台或背景，登場人物大多不是一般日本人，加上陳舜臣本人的姓名也看起來像是典型的「中國人」，獲得江戶川亂步文學獎的《枯草之根》被評為：「作品中登場人物多是居住神戶的中國人，這些人物表現出濃厚的大陸風格以及中國式的道德觀。特別是對業餘偵探角色中國人性格的描寫別有風趣。」<sup>2</sup>然而，到現在為止，大部分的評論家及研究者尚未深入探討，陳舜臣文學的出發點與二戰後日本的華僑、

華人、台灣人社會的情況之間有什麼關係。

獲得江戶川亂步文學獎的《枯草之根》是以神戶華僑、華人社會為舞台的推理小說，大部分的登場人物是中國裔，主人公陶展文的本籍是中國陝西。陶展文住在神戶很多年，在海岸通經營中華料理店並無照開設中醫診所，鄰居都相信他是名醫。他是中國武術高手，每天練武的強壯身體使他的外表看起來像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但其實已有五十歲。陶的武術徒弟小島是報紙記者，在調查神戶市議員吉田的貪污行為，他懷疑一個從事金融業的老中國人徐銘義暗中幫吉田送錢。陶展文是徐銘義的老朋友，經常和他一起下中式象棋，但有一天晚上在徐銘義住的公寓下棋，第二天陶展文卻接到小島的通知，徐銘義被發現陳屍在公寓裡。陶展文對徐銘義十分同情，活用年輕時在大陸從事情報相關工作之能力，一邊協助警察一邊開始獨自調查……

陳舜臣出版《枯草之根》時，在日本文壇盛行松本清張等的所謂「社會派推理小說」，描寫沒有特別的才華之無名刑警，或是一般老百姓堅持不懈地調查案子，這種作品十分受歡迎。《枯草之根》的主角陶展文是所謂的「名偵探」，就這一點看來，《枯草之根》較接近經典偵探小說的風格。然而，在戰後日本，松本清張、橫溝正史等推理小說家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的社會動亂為背景創作推理小說，陳舜臣似乎受了他們的影響。因為，松本清張、橫溝正史等人的推理小說中出現的殺人動機或圈套，多以戰爭前後的社會體制、人際關係之變動為背景。<sup>3</sup>《枯草之根》中也出現利用二戰前後的社會動亂而取代別人的人物，為了隱蔽過去而殺人。

但是，陳舜臣作品與松本、橫溝等的作品不同的地方是，強調住在神戶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案子和大部分的登場人物的背景不僅於日本國內活動，也涉及中國大陸、東南亞、美國的國際華裔社會。主人公陶展文有亡命經驗，他戰前留學東京後，回中國大陸待了幾年，但因「有些人推測他因深入過政治活動，而厭煩了」而再移居日本。獲得江戶川亂步文學獎時，陳舜臣表示：「這部作品的舞台是神戶。我自己也是中國人，屬於華僑社會。在戰前大部分的同國人的來歷很明顯，但至於戰後來到日本的同國人，不能清楚他們以前做什麼。這是我書寫作品的動機。」<sup>4</sup>在神戶華僑、華人社會的人際關係中，二戰前後亞洲社會動亂之影響十分深刻，陳舜臣有意識地利用此情況設計殺人圈套。

《枯草之根》反映戰後日本的華僑、華人所面對的社會景況。然而，除此之外，為進一

步了解陳舜臣的初期作品，亦須考慮的時代脈絡應包含當時在在日華僑、華人社會中流行的左派思想。

1945 年日本戰敗後，中華民國為戰勝國之一，台灣人因之「恢復」中華民國國籍。日治時期旅居日本並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原與日本華僑分屬不同的群體，日治時期結束後被稱為「新華僑」，加入在日華僑、華人社會。<sup>5</sup>

1946 年國共內戰爆發，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圈產生支持國民政府和支持共產黨之對立。當時，許多人沒確切表態，然而，贊同共產黨的比例似乎相當多。據 1948 年底中國留日學生同學總會舉辦的問卷調查，在日中國留學生 234 人中，各政黨的支持人數如下：國民黨 12、共產黨 27、民主同盟 37、中立 87。支持國民黨的人數最少，中立的人數最多。中國民主同盟獲得支持的原因在於，民主同盟原以知識份子為基礎，並積極設立海外組織。其實，民主同盟雖和共產黨是不同的組織，但當時積極開展批判蔣介石獨裁的運動，其政治主張接近共產黨。<sup>6</sup>而且，當時，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存在、戰後日本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以及朝鮮、印尼、印度、菲律賓等亞洲留學生形成的國際學生結盟等，這些要素促使在日中國、台灣學生批判國民黨政府。甚至在中國共產黨呼籲華僑和留學生返國投入建設新中國時，於 1953～1958 年間歸國的華僑留學生大約 4000 人，其中台灣人約占三分之一。<sup>7</sup>

其實，從 1961 年陳舜臣發表的成名作《枯草之根》中，可以看到戰後不少日本華僑知識份子左傾化的痕跡。在作品中扮演案件關鍵人物的李東昌在最後告白中提及過往經歷時，他說以前在上海為建立「民族產業」盡力而為，戰後移居神戶也依舊夢想著成為海外民族產業的旗手。

和當時中國年輕的知識份子一樣，我也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使瀕臨衰敗的祖國重生，一定要增進國力和國富。我用自己專攻的學問，描寫了提昇國家經濟實力的夢想。學生時代時，我偷偷以「中國經濟進展要綱」為題，作出不成條理的計畫書。計畫書中提議，將建設擁有十五個堤防的不凍港，而在揚子江的河口修築取代上海的大都市。  
(中略)

有關上海經濟界的狀況，我想你也知道，真是一言難盡。官方資本掌握生殺大權，回憶使人斷腸。民族產業均遭撲殺，無從遁逃避，興祥隆銀行持過的民族產業全部倒閉，

連銀行本身都垮了。我到美國尋救援救，但敗興而返，長年以來的夢想就此破滅了。<sup>8</sup>

在文本中李東昌的「告白」即是，期待讀者同情的部份。因此，可視為文本的執筆人表示對「民族產業」的同情、以及對「官方資本」的反感。

「民族產業（民族資本）」指的是，清朝末年對外國勢力開放中國市場後，為因應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政策，中國逐漸興起的現代產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是戰場，使得中國國內紡紗、製粉、火柴、香菸、肥皂等輕工業急速發達。此類民族資本發達，促進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現代化、革命、民族運動。然而，1920年代以後在外國資本的攻勢中，民族產業不振；抗日戰爭結束後，在國民黨支配地區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方資本試圖獨佔市場，壓迫其他的私人民族資本。反之，1949年於國共內戰取得勝利的共產黨則公開宣布尊重民族資本。1949年4月25日在人民解放軍發布的文章上，毛澤東表示：要保護民族資本的工業、商業、農業、牧畜業。<sup>9</sup>先別說日後中共實際上如何對待民族資本家，但至少當時在中共的邏輯裡，必須尊重民族資本的歷史地位。因為，即便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而必須將民族資本國營化，但在促進中國現代化與抵抗帝國主義的過程中，一些民族資本家扮演過的角色及其功勞必須給予尊重。<sup>10</sup>

如前所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日本華僑、華人社會中，許多知識份子對國民黨失望，不少人對於中國大陸進行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心生憧憬。可以說，《枯草之根》也存有與華僑、華人左傾化現象相同的歷史脈絡。作品裡針對民族產業的同情，呈現對當時已經遷台的國民黨政府的反感，以及相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心情。

《枯草之根》出版翌年，1962年陳舜臣發表的推理小說《割破 陶展文的推理》一書中，也安插了支持新中國的關鍵人物。在香港的日商企業從事打字員的林寶媛赴日旅遊時，透過朋友的介紹住進了陶展文的房子。林寶媛告訴陶展文，她有一個優秀的哥哥林東策，他肩負了整個家族的期待赴美留學，但卻在幾年前失蹤了。根據林寶媛的說辭，留美期間哥哥似乎受一個朋友的影響，情緒被搖動，這個朋友正是「希望為新的社會主義祖國貢獻自己學習的學問，為此要回國」<sup>11</sup>的人。陶展文十分同情林寶媛，承諾幫她尋找似乎在日本出沒的哥哥，後來便活用華僑界中的人際關係展開調查。

林東策與其朋友不見得是陳舜臣本人的替身，但陳語帶同情地描繪一心憧憬為社會主義

中國貢獻的青年。可以說，林東策和其朋友的人物形象是，戰後神戶的許多左翼華僑青年之投影。因為，二戰後許多在日華僑嚮往社會主義，故而響應人民共和國的呼籲前往中國大陸。

### 三、二二八事件的痕跡

陳舜臣初期作品確實反映了當時日本華僑、華人界的左傾化現象。然而，我們仍要考慮陳舜臣的台灣背景特別是當時日本華僑、華人界中，在日台灣人不得不面對的特殊經驗——1947年2月在台灣爆發的二二八事件。

在2003年出版的自傳《路半上》一書中，陳舜臣回顧自己在日本戰敗後回台走過二二八事件的經歷，敘寫當時的恐怖體驗。日本戰敗後，因喪失日本國籍，陳舜臣不得不放棄成為國立大學教授的目標，而後為了學習中國歷史、文學且深入了解故鄉，1946年赴台北縣新莊擔任英文教師。但翌年在新莊，他聽到從台北方向傳來的槍聲，並透過政府收音機廣播、傳言以及美國雜誌接獲二二八事件的消息。

當天我留在叔父家中。外面傳來拍拍聲響，隔壁的爺爺還一派悠閒地說：

「那是爆竹的聲音嗎？哎呀，今天是哪裡辦廟會呀？」

不過從集會回來的叔父邊搖頭邊說：

「阿山好像在反擊啦。我們這附近邊沒有人找過阿山的麻煩，如果能不出大亂子就好啦。（中略）」

雖然聽見聲音，但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想要聽到接近事情真相的談話，得等到許久之後了。

當時許多人都喪失性命。於日本長大、在台灣幾乎沒有熟人的我，少數交往不深的友人中竟也有遭槍擊（或刀傷）而殞命的犧牲者。<sup>12</sup>

其實，日本華僑界之中，造成台灣人左傾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二二八事件。歷史學者何義麟表示，二二八事件之後，在日台灣人大致有四種反應：第一、認同國民政府；第二、對國民政府抱有反感，認同中共；第三、對國民黨有反感，走向台灣獨立運動；第四、因恐怖記憶，迴避在公眾前提起二二八事件。其實在日台灣人多數的反應是，迴避提起二二八事件

和政治思想相關問題。然而，年輕知識份子的左傾化現象十分明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海外台灣人團體每年都在2月28日舉辦紀念活動，《中國留學生報》、《華僑民報》等日本華僑的刊物則再三刊登這類紀念活動的訊息，還在許許多多記事中，從支持中共的立場發布批判國民黨在台暴政之言論。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消息強化了在台台灣知識份子親共產黨及反國民黨之趨向，並激發他們對社會主義和祖國的憧憬。<sup>13</sup>

由此看來，陳舜臣初期作品中的左傾要素，必定與二二八事件有關係。可以說，與許多在台台灣人知識份子一樣，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陳舜臣也對國民政府十分失望。但當時，陳舜臣一般不直接批判國民黨，僅透過描寫民族資本家間接表達對國民政府的反感。他似乎對中共較有好感，但經常迴避二二八事件和國共對立的相關議題。

首次指出陳舜臣作品受到二二八事件影響的學術論文，即是徐韻婷《陳舜臣における華僑像——『枯草の根』を中心に》。徐韻婷指出，在二戰後神戶華僑社會中台灣人的人數比例超過半數，並有不少人士居於富含影響力的地位。局勢如此，作家陳舜臣在《枯草之根》中卻未描寫台灣人。據徐說，二二八事件後白色恐怖盛行，許多知識份子被殺害或下獄，陳舜臣逃出台灣後，在日本仍保持警戒，壓抑著不書寫台灣、中華民國有關的題材。主人公陶展文「因深入過政治活動，而厭煩了」的這種人物設定，也反映出陳舜臣二二八後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之體驗。<sup>14</sup>

我基本上贊成此看法，因為《枯草之根》得獎時，朝日記者向陳舜臣提問：「現在的中國問題怎麼樣？」，陳卻迴避，只說：「跟江戶川亂步獎沒有關係」。<sup>15</sup>而且，《枯草之根》及《割破 陶展文的推理》出版翌年，1962年陳舜臣發表的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雖以日本戰敗後不久的台灣鄉下為舞台，但刻意避開二二八事件。

《憤怒的菩薩》的主人公楊輝銘戰前留學日本且在日本任職，結婚後和妻子林彩琴一起坐貨物船回台灣。他們的故鄉菩薩莊是一個鄉下農村，從台北出發坐公車二十分左右就能到達。抵達菩薩莊的第一天他們聽到了殺人事件的相關消息：武裝解除後，附近等待歸國的日本軍人川崎少佐被殺害了。國民政府司令部派遣崔上校、葉中校著手調查之後，楊輝銘他們在林彩琴娘家遇到一個出乎意料的人——二戰時為了投入抗日運動而前往上海，後來被通知已病死在大陸的彩琴哥哥景維。當彩琴一家人仍沉浸在景維突然歸來的歡喜中，翌日景維竟然就被射殺了。

在陳舜臣的作品中，《憤怒的菩薩》並不算有名，也未受重視。然而，因其內容詳細描寫初初迎來國民政府的台灣，這篇小說十分值得關注。作品中，除了杏仁湯、肉粽、香蕉、媽祖廟、布袋戲、紅磚壁的鄉下農家、甘蔗田等台灣獨有的異國情調，也描寫「光復」不久的種種社會狀況。例如，在返回台灣的船上有許多台灣人唱歌消遣，受日式教育的他們只會唱幾首台灣民謠，此外自然而然就唱日語歌。到達基隆港後，賣香蕉的男人向主人公夫妻使用「一隻狗走了，一隻豬來了」比喻「光復」後的台灣。抵達菩薩莊之後，他們遇見為了適應新時代而好學的少年，週週騎自行車去台北學「國語」。

小說的部分內容寫出剛接觸外省人時，台灣本省人生發的微妙困惑。例如，彩琴娘家的父母不知該怎麼應付來村莊調查案子的大陸軍人，不自然地招待著他們。主人公楊輝銘和那些軍人見面時，因嚮往「真正的中國人」，始終對他們抱有好印象，覺得必須努力和他們好好溝通。雖然如此，他還是摒除內心那股不相容的感覺，在心裡自言自語：「回國後，我所見到的來自大陸的人，只有崔和葉兩名軍人。我認為葉中校是名優秀的軍人，而崔上校則是個摸不清本性，典型的中國成年人。／我對他印象不壞，但總覺得必須有所提防。我們能夠敞開心胸暢談的對象，終究只有環境和生活方式相同的人吧？」、「回歸中國版圖的台灣人，背負起的不幸。五十年的隔離，導致台灣和大陸之間僅剩下『漢族意識』在維繫。理所當然的，我們必須從這裡重新出發」。<sup>16</sup>

這篇小說顯然是根據作者本人回台灣的體驗書寫的。主人公對兩位外省軍人抱有的不相容的感覺，暗示未來會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憤怒的菩薩」這個題名也可能暗示因屠殺事件而產生的憤怒。雖然如此，這篇小說的情節完全早於二二八事件，除了賣香蕉的人說出「一隻狗走了，一隻豬來了」這句比喻，幾乎沒有描寫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直接發生的衝突。陳舜臣雖鼓起勇氣描寫外省人初來乍到的戰後台灣，但他還是不敢直接提起回台灣後他自己經歷過的強烈體驗。其實，不僅初期作品，2003年出版《路半上》之前的大半個世紀，陳舜臣始終迴避，不去書寫二二八事件和戒嚴令下的台灣。

如前所說，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旅居日本的台灣人社會中，雖有年輕知識份子的左傾化現象，但最常見的反應是不敢在公眾前提起事件。許多在日台灣人不敢碰觸政治問題，專注自己的事業。對於冷戰時期旅日台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的恐懼，何義麟有如下解釋：

在島內還是戒嚴的年代，日本擁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是並非所有生活在日本的台灣人，都擁有充分的二二八相關資訊。因為，二二八是個高度政治性的議題，而他們大部分都是盡量避免捲入政治、實際參與獨立運動或支持中共活動，比例上都是屬於少數。對於抱持這種處世態度的人，在日本有一個用語「ノンポリ」來稱呼，這是「ノンポリティカル (non political)」的簡稱，1960年代學生運動時期出現的和製英語。(中略)

但在訪談旅日台灣人的過程中，竟然有人選擇用這個詞，說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並強調冷戰時期大部分的在日台灣人都是採取這樣處世方法。換言之，他們不參與獨立運動或支持中共的活動，極力想避開政治干擾，特別是跟台灣還有往來的人士，為了避免遭到迫害，必須謹慎面對這些政治禁忌。<sup>17</sup>

《憤怒的菩薩》這篇小說中，確實含有暗中批判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的部分。這些部分的時代思想脈絡可說是，與《枯草之根》中的民族資本思想相同的。但另一方面，《枯草之根》迴避在日台灣人和中華民國相關情事，《憤怒的菩薩》仍猶疑著不直接提起二二八事件。可以說，陳舜臣的這種態度，和許多在日台灣人面對二二八事件卻於表述的那種政治姿態是一致的。

陳舜臣內心抱有對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政權的同感，有時候在作品中間接寫下這種心情，但基本上不敢直接批判國民黨，並迴避提及國民黨獨裁統治下的台灣、以及國共對立問題——像「ノンポリ」的這種態度就是陳舜臣初期作品所呈現的政治態度。我認為，他對政治思想的這種態度，後來仍繼續影響冷戰時期的創作活動。1960年代中期以後，陳舜臣開始撰寫許多中國歷史小說，他筆下的中國歷史形象，也可以看到這種態度。

#### 四、創造中國認同

在陳舜臣初期推理小說中，可以看到一種避開「政治」的態度。此態度原是他的二二八體驗所造成的，但陳舜臣並非全面迴避「政治」。因為，冷戰時期他透過書寫大量的歷史、推理小說描寫超越左派、右派這種思想對立的「中國」民族意識。

如前所說，在《憤怒的菩薩》這篇小說裡面，陳舜臣描寫主角一個台灣人面對外省軍人時壓抑不住心中不相容的感覺。但即便不習慣與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溝通，卻始終勉力為之。

因為，他覺得他要「成為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接受過日本教育，隨著『皇民化』的口號被教育成日本人。然而，台灣『光復』之後，我們就光明正大地變成『中國人』。

成為中國人。——問題是，何謂中國人？我還無法確切明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會被塑造成什麼樣的人。

這真是一個難題。

我到底打算成為什麼樣的人——或者說，我必須成為什麼樣的人？或許我可以從眼前這兩人身上，找到部分的解答。<sup>18</sup>

對主人公楊輝銘而言，「中國人」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是要釐清形象且刻意形塑的對象。日據時代的台灣人被教育要成為日本人，使得二戰後的他們無法自然地當「中國人」。陳舜臣有一部分小說刻劃尋找「中國人」認同的台灣人主角，「該怎麼成為中國人」是冷戰時期陳舜臣文學的主要題目之一。

例如，1971 年他出版的長篇小說《殘絲之曲》，描寫為了成為「中國人」而奮鬥的台裔華僑少年。

1926 年，主角關修平小學即將畢業前，養父母揭露其身世秘密——他其實不是日本人，而是貿易商新福隆公司的經營者神戶華僑關啟成的私生子。他懂事之前即被託付給日人夫妻，因其兄長死亡，父親決定讓修平當繼承人。為了成為公司繼承人，修平移居位在神戶的商館，重啟作為「中國人」的生活，開始學習三字經、北京話以及福建話。因為，關家原來是廈門籍，修平的祖父為擴大公司規模移居台灣。1895 年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時，祖父把台灣的據點交給長子啟雲，帶著修平的父親逃回福建。是以修平的父親啟成是中國籍，伯父啟雲則是日本籍。伯父的兒子昌平雖然是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但卻是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鼓勵修平學中文。在神戶的父親家，修平勤奮學習的當口，也苦於「相當明確地意識到自己被撕開成兩半」。

後來修平到香港、廣州、上海遊學。在香港的立誠書院他結識來自越南的革命運動家吳隆天，在上海時則接觸反對日本統治台灣的抗日民眾運動，且收到堂姐瑤琴寄給他呼籲台灣

革命運動的傳單。中國意識漸次加深的修平決心為了「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中國人」到中國內地旅行。他在甘肅、新疆遭遇匪賊、民族糾紛等種種冒險之後，收到父親病逝的消息，返回神戶為重建公司努力。而後，在上海活用在大陸各地遊學時所獲得的人際關係工作時，修平不僅邂逅從事革命運動的堂姐瑤琴，還和兒時摯友服部功介重逢，此時的服部已變成右翼亞細亞主義者，要求修平幫他的忙。

稻畑耕一郎曾指出，表現「對身為中國人或日本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之煩惱」的主題與陳舜臣的出身有密切的關係<sup>19</sup>。他表示，陳舜臣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華僑，而且二戰結束前是「日本人」，如此複雜的背景賦予他作品特別的風格。我贊同此看法，但除了民族認同的煩惱外，我想從「創造想像的共同體」的視角探討此作品，用以解讀藏匿於這篇作品中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世俗的朝聖」概念。

在《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安德森指出，在現代民族主義的成長過程中，某範圍內民眾不斷移動的「世俗的朝聖」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例如，18-19世紀間中美洲及南美洲諸國的歐裔海外移民間，盛行民族主義和獨立運動，專制主義官員在殖民地行政範圍內不斷移動的過程中，移民人口逐漸發展出「我們」的意識。<sup>20</sup>此外，除國內旅行外，現代交通工具及旅行產業發展，使得移民能頻繁來往於出身國家和居住國家之間，此移動影響移民的歸屬意識，而促進發達「遠隔地民族主義」。

《殘絲之曲》的主人公關修平煩惱於「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的認同問題，未了趨向「中國」認同。在此過程中，他從神戶出發後走遍廣東、香港、上海、甘肅、新疆等中國各地，接觸各式各樣的土地、民眾、社會。讀者目擊關修平隨著接觸中國各地的民眾而深化其「中國」認同。修平的旅程相當於培養「遠隔地民族主義」的「世俗的朝聖」。

民國時期，隨著經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等事件一一發生，中國民族主義急速發達。其中的推手也包含，當時迅速發展起來的亞洲海運和中國大陸各地的鐵路、汽車公路、飛機航路。關修平的新福隆公司在神戶、台北、以及中國大陸各都市間從事貿易產業，他的遊學和生意都以發達的船運為前提。清朝末年中國大陸的鐵路才開始發展，辛亥革命以後各地軍閥陸續建設鐵路，至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後，在行政院下設立鐵道部，努力構築大陸各地的鐵路網。<sup>21</sup>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關修平到大陸旅行，大部分旅程都可能利用了當時發展中的鐵道網。此外，他前往蘭州時坐飛機，而後又以翻譯者的身份，隨同建

設新綏公路的長途汽車公司團隊，前往西部各地。

現代海陸空交通工具及產業的發展，使得大量大陸民眾、海外華僑、華人、以及《殘絲之曲》的主角關修平能實行「世俗的朝聖」。這篇小說透過描寫主人公走遍中國各地冒險，讓戰後日本讀者（含華僑、華人、在日台灣人）在紙上與他一同體驗旅程。

換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期，亞洲各國、各地區之間的交通被限制，除了刺激戰後日本讀者對西域等中國大陸的地區產生憧憬和異國情調以外，《殘絲之曲》這篇小說也企圖讓從「祖國」被隔離的華僑讀者在紙上參加往中國各地的「世俗的朝聖」，藉以打動他們的「遠隔地民族主義」。從這點看來，這篇小說具有高度政治性。

陳舜臣出版《殘絲之曲》時，並沒有實際走訪中國大陸的經驗，只能依靠文獻資料和想像力書寫大陸之旅。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當年他才首次踏上大陸；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後，更是頻繁的前往中國旅行，出版《敦煌之旅》（1976）、《絲路之旅》（1977）、《北京之旅》（1978）等遊記，另外還隨同日本 NHK 台取材隊，擔任紀錄節目《絲綢之路》（1980）的講述者。實質經歷「世俗的朝聖」之後，活用此體驗，陳舜臣撰寫長篇歷史小說《桃花流水》（1976）一書。

與《殘絲之曲》相同，《桃花流水》也以 1930 年代神戶和中國大陸各地為舞台，描寫台裔主角尋求中國認同的人生旅程。此書的讀者和主角程碧雲一起走遍更多的土地。主人公碧雲的父親是上海財閥程家三子，母親是台灣茶葉貿易商的女兒。但幼年母親逝世，十二歲時父親被謀殺，父親的日本朋友根津因而收養她。在神戶北野町長大成年後，在她不時收到的黃色小紙片上有「龍」的簽署，也有這樣的字句：「碧雲，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妳父親是愛國人士。不要辱沒父親的名字」。碧雲宛如被此小紙片引導著前往台灣，之後走遍上海、北京、八達嶺、山西大同、內蒙古包頭、西安等各地。利用船、鐵路、汽車等交通工具周遊華北各大都市、偏遠地區的過程中，碧雲發現父親程範其實沒死，為了投入抗日愛國運動他偽裝遇難。抗日戰爭激化的時代背景下，在大陸各地碰上種種人物、風俗、事件時，碧雲彷彿不斷聽到父親的教導聲「要仔細看，自己的國家有種種模樣。你好像不太了解故國」。後來，在父親的指導下，碧雲也投入抗日地下組織的情報工作，但戰火激化，在日本長大的她擺盪於中國和日本之間。

在此要特別關注，《桃花流水》這篇作品裡，主人公走遍中國各地的「世俗的朝聖」過程

中，「台灣」被形塑為該給「中國」收回的「淪陷區」。如上所說，《殘絲之曲》中出現主人公堂姐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的左翼運動，主角本人也在上海接觸到要求歸還台灣的遊行。在日台裔少年取得中國認同的過程中，佔有重要位置的要素之一是台灣。在《桃花流水》中，有段場面直接描寫，進行認識中國之旅時主角程碧雲前往母親的故鄉台北新莊，她親眼目睹了正在進行「皇民化」的台灣，遇到抵抗殖民的那些人物。

在開往基隆的船上，碧雲初遇固執抵抗皇民化的台灣老名士杜英堂，他以前曾因為在演講會上說「我們中國人」而被日本憲兵打過。看到陸地時，他向碧雲說道：「那是台灣。怎樣，看起來很悲傷是不是？」。到達新莊後，有舅舅和其他家人款待碧雲，初次見面的表弟張永鋒一邊帶路一邊批判日本殖民主義。個性十分激烈的永鋒在中學領導台灣學生從事抗議運動，結果被退學了。

「這是名譽的問題。名譽的。……人類的尊嚴在這裡被否定。例如，學歷、能力同等的人在同一職場工作時，台灣人領的最初的工資五十元的話，日本人會領八十圓。不僅以後升級速度不同，開始時也早已有四成的差別。能不能忍耐？」

永鋒小聲說，語言卻充滿魄力。攥緊的拳頭稍微發抖。碧雲從此看到了表弟的激烈個性。雖保持有點的距離走路，但永鋒的熱情彷彿直接影響到她的皮膚。（中略）

隔一條很寬的大道，兩人站在總督府建築前面。

「我們把它叫做阿房宮」

永鋒似乎壓抑激情，以比平常慢的語氣說。宛如怕語言會燃燒起來。

阿房宮就是秦始皇營造的大宮殿。有紀錄一萬人能容易坐在其台上。選擇此綽號的理由似乎是，除形容大建築外，打算讓阿房聯想到阿呆。（譯注：（日語中，阿房唸成「a bou」，阿呆唸成「a hou」。後者的意思是『笨蛋』））。<sup>22</sup>

後來，永鋒前往中國大陸投入抗日民族運動，被日軍飛機攻擊而戰死。如前所說，1962年的《憤怒的菩薩》早已描寫過自願前往大陸的台灣青年，《殘絲之曲》也有在大陸從事抗日運動的主角堂姊。日治時期前往大陸投入抗日運動的台灣愛國青年，在陳舜臣作品中是常見的人物，都被同情地描寫。而且，《殘絲之曲》和《桃花流水》這兩篇小說，主角的血緣關係

都涉及全亞洲華僑、華人區域，從而影響其民族意識。台灣被形塑成和大陸各地、東南亞、日本等華僑、華人區域之間具有血緣關係的地方，並足以充當出場人物發展「中國」認同的過程中頻頻接觸的關鍵土地之一。

## 五、迴避「政治對立」的中國形象

其實，在陳舜臣的文學世界裡，經常出現與台灣有淵源的貿易公司。這些貿易公司在清朝時期自福建發跡，買賣茶葉、海產等，後來拓展到台灣、中國大陸各地、日本乃至於東南亞等地區。每個地區的分店都有血緣關係，家人從不同立場關心或主動支持建立現代中國。1967年陳舜臣出版長篇小說《鴉片戰爭》，後來發表相當於其續篇的《太平天國》(1982)、《山河在》(1989)，這些作品中出現的「金順記」正是其代表。

《鴉片戰爭》之後，陳舜臣開始書寫大量歷史小說，逐漸建立其為歷史小說作家的社會地位。《鴉片戰爭》的內容以創立「金順記」的連維材一家為主軸，描寫清朝末期面臨鴉片戰爭的中國社會。貿易商連維材是走在時代前頭的人物，了解海外景況和英國海軍的強勢，預知中國社會將面臨無法避免的危機和大變化。他料到會開戰，於是抱著使命感獨自準備資金，支援林則徐加強海防。鴉片戰爭之後，連維材的長子統文渡台並娶當地女性，次子承文和么兒理文前往香港、上海，各擇一地做為「金順記」的據點加以發展。在《太平天國》、《山河在》這些作品當中，「金順記」一族持續登場，對洪秀全、孫中山等人物懷抱期待，始終支持民族革命運動。

這些作品將連家和林則徐形塑成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驅。林則徐開始取締鴉片時早已料到戰敗是一無可免，心裡卻說：「英國一旦出兵，大清國不可能取勝。但是，現在必須要明確表示反對鴉片的決心。因此，即使王朝覆滅，也應當顯示中國人的正氣」<sup>23</sup>；敗相漸顯後，連維材認識到培養現代產業的必要性，想道：「不做賣鴉片、就無法養家活口，這種狀況單憑嚴禁鴉片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的。需要辦產業，而且必須是近代的產業。除此之外，別無拯救國家的道路可走」。<sup>24</sup>

在作品裡，二十世紀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出現之前，林則徐、連維材及他的兒子們早已擁有超越王朝的現代民族主義和民族資本概念。其實我非常懷疑鴉片戰爭那年代的清朝官界和經濟界早已有這種現代性的思維形式。一般來說，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和民族（國族）

主義 Nationalism 即是在 18 世紀歐美開始發達的國家形態或民眾意識形態，陳舜臣顯然將二戰後日本華僑界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投影到 1840 年代的清朝。換言之，連家的人是在神戶台裔華僑貿易商人家庭出生的陳舜臣本人的替身。《鴉片戰爭》一書雖參照大量歷史資料，但不一定就客觀的敘述歷史，而是反映日本台裔華僑的處境和思想。

例如，這些作品中出現一對「混血」姊弟——印度波斯族商人和清人生育的西玲和簡誼譚。誼譚是在英人和清人之間做買辦還兼賣鴉片的騙子，幾乎不把民族認同問題放在心上，但西玲卻經常煩惱「中國人」和「洋人」之間的認同問題。我不得不懷疑當時清朝已經有依靠人種或民族血統來認定「中國人」的概念。歷史上的中國大陸原本就是眾多族群、人種聚集交錯的地方，「華」、「夷」之別的標準並不在於人種、血統，而在於是否接受一定的文化、價值觀等。而且「民族 ethnic group」、「人種 race」、「中國人 Chinese」原本就是從歐美現代文化發展出來的概念。換言之，苦惱於民族認同的混血美女西玲——這種人物形象反映身為旅日台裔華僑作家陳舜臣本人的背景，並與現代西方發達的民族及「中國人」概念相結合。小說《殘絲之曲》、《桃花流水》中令主角煩惱的時代背景也是相類似的，現代民族國家「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修平、程碧雲等角色始終在乎自己的「中國血統」。

1990 年代以後，通過散文、訪問記等，陳舜臣時常表示所謂「民族」是現代以後才有的概念，現代亞洲人不可能明確地擁有「中國人」、「日本人」這種意識。《琉球之風》、《耶律楚材》這些晚期作品中，他描寫超越民族主義而活躍著的種種人物。然而，陳舜臣於冷戰時期發表作品當中，「台灣」即以這種現代民族國家「中國」概念為前提，做為構成此一「中國」的重要部分。對陳舜臣而言，在作品中置入跨越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東南亞之華裔貿易公司是創建「想像的共同體：中國」形象的一種方法。這個形象是，日本華僑、華人、在日台灣人以及作家本人尋找民族認同的歷史根據。此尋根旅程中，台灣和大陸之間的關係被形塑為因血緣羈絆而結合起來的共同體。

其實，就最近的亞洲國際情勢而言，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這種歷史觀總會無可避免的引起政治性爭論。尤其是在盛行台灣意識的台灣，陳舜臣此般中國歷史觀恐怕會引來許多民眾及知識份子批判。台灣是否屬於中國，此議題包含高度政治要素，冷戰時期陳舜臣的作品本擁有此政治性。1960 年王育德等台灣知識份子在日本創立《台灣青年》刊物並開始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即便如此，陳舜臣書寫《鴉片戰爭》、《殘絲之曲》、《桃花流水》等作品時，似乎沒有興起政治爭論的意圖。可以說，當時對陳舜臣而言，在日本華僑、華人、台灣人社會當中，相較於台灣是否屬於中國的議題，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之間的對立問題更加嚴重。他書寫「金順記」一族的理由之一是，在日本華裔社會中，以「中國」的名義，試圖讓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衝突趨於融洽。他為了避免台灣系和大陸系之間發生政治衝突，故而撰寫視台灣為中國一部分的一種「尋根文學」。

如前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華僑、華人、台灣人社會中，流行左翼思想，從陳舜臣初期作品裡也可看到此現象的影響。之後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對侵略戰爭的罪責情緒、對共產主義的憧憬、對高度經濟成長社會的失望、以及資訊不足等種種理由，促使許多日本知識份子發表讚美文革的言論。當時陳舜臣也無法避開此一趨向，有時會發表為中共辯護或讚美中共的文章。例如，1968年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安部公房、石川淳發表聲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侵犯了學問藝術的自由」後，陳舜臣用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有文化差異的邏輯為中共辯護：「對中國人來說，文學者被捲入政治的漩渦，也十分正常。即使受到彈壓，當事人也會覺得理所當然。」<sup>25</sup>抑或是1972年中日國交恢復時，陳舜臣立刻以探親的名目首次渡海前往中國大陸。返日後在1973年發表的文章中，他解釋因中國沒有秘密警察，因而人民的表情都很明朗；又因尊重生命的思想和人類主義實施徹底，所以建設南京長江大橋時毫無犧牲者等等<sup>26</sup>。另外，毛澤東過世時他也發表過讚美毛的文章。<sup>27</sup>

冷戰時期陳舜臣支持中共，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雖然事實如此，在他大量發表的小說作品中，基本上不碰觸國共對立和同時期的台灣相關題材。《殘絲之曲》、《桃花流水》這些作品的時代背景是1930年代，某些登場人物似乎是共產主義者，但都沒有清楚地交代主人公參與的抗日運動組織傾向共產黨或國民黨。沒有特別讚美中共的場面，也沒有特別批判國民黨的場面。而且，他大量的撰寫以現代中國為舞台的歷史、偵探小說，但大多是民國時期以前的故事，並不書寫同時代的中國大陸、台灣。鴉片戰爭和抗日戰爭被中共、國民政府視為民族解放戰爭。1974年他出版自傳性小說《青雲之軸》，描寫台裔神戶華僑少年「陳俊仁」的成長，但故事到日本戰敗為止結束。從1980年到1991年陳舜臣出版畢生大作《中國歷史》(全十五卷)以及《中國歷史 現代篇》(全四卷)，但歷史記述到辛亥革命時期為止結束。1983年出版的《中國五千年》寫到人民共和國成立，但只是簡單介紹過程概略而已。描寫二戰後的

小說作品基本上都以神戶等日本華僑社會為舞台，皆未清楚提到支持北京或台北這類政治要素。

陳舜臣書寫的小說數量龐大，而且其時代背景涉及古代乃至於民國時期，只欠缺以二戰後中國大陸和台灣為題材的小說。可以說，其理由之一是，二戰後他在台北經歷過的二二八事件的恐怖體驗。如前所說，二戰後在日台灣知識份子中流行支持中共的思潮，但多數人害怕提起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政治議題。陳舜臣的初期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十分擔心提起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後來他依然不敢書寫二戰後台灣、中國大陸相關的題材。我認為，撇除親身經歷，還有另外一種理由。這是二戰後神戶華僑社會的特色所帶來的理由。

經過阪神大震災後，2000年神戶中華會館出版《落地生根 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一書之際，陳舜臣所做短文表示：「我希望只有音樂會、義賣會、祝賀會等時我們中華會館才熱鬧。希望再也不要將政治對立等緊張原因帶入這裡。我想我們會館基本上必須總是和睦相處。」<sup>28</sup>可以說，他在此所說的「政治對立」是指東西冷戰時期的政治思想對立。亞洲東西冷戰使得標榜代表「正統中國」的兩個不同政權各自成立，但陳舜臣在此表示不希望神戶華僑社會發生此類思想對立。其實，此看法與中華會館所表示的歷史觀相符合。《落地生根 神戶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記載了冷戰時期神戶華僑社會的政治對立問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內戰結束，憑藉第三國際的指導中共在亞洲諸國展開赤化工作，中華民國政府也傾注心力在海外華僑的思想教育上。此一背景下，1952年在橫濱中華學校發生紛爭，教員和家長爭論如何講述中國社會的變化，1953年約有七成學生轉學到支持中共的橫濱山手中華學校。與此同時，神戶中華同文學校建設新校舍時資金不足，但因怕影響學校的主體性，謝絕國民政府的支援。當時北京政府也提議捐錢，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並未公開此事，所存入的資金也始終留存並未使用。對此中華會館表示：「如此華僑團結，成功堅持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66年到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給在日華僑帶來大影響，神戶也發生若干混亂，神戶華僑卻能保持團結」。<sup>29</sup>

據華人華僑研究者張玉玲說，和橫濱華僑界比起來，冷戰時期在神戶華僑界大陸系和台灣系之間的對立比較少，這也影響了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的展覽方式。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是神戶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德仁在1979年設立的，展示與日本華僑相關的1000多筆資料及10000冊書籍、雜誌。其展覽旨在表達，江戶時代末期神戶港開港後，華僑如何創業，如何

生根，作為日本社會的成員如何貢獻發展神戶。張玉玲表示，此博物館十分關心神戶華僑界各式各樣的文化、思想、信條。

（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幾乎都沒有提到，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中日關係發生大變動的時期華僑有什麼動向這種問題。從此可以看到盡量迴避中國和台灣相關的政治要素。或是似乎有判斷，為了明確地表示生根於神戶的民族認同，應該避免被這些政治立場影響，而描寫和居住地神戶、日本之間的關係才好。（中略）

我認為根據此「顧全大局」及互相照顧的傳統，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毫無展覽恐引起政治對立的資料。可以說這是，定居日本社會的民族集團，為了保持華僑社會的團結而積蓄的智慧。<sup>30</sup>

陳舜臣個人雖抱有支持中共的情緒，但小說中始終沒提到台灣政府和大陸政府之間的對立。可以說，其理由與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的展覽方式具有相同的背景。他不提二二八事件以及兩岸之間的對立相關要素的理由，除了被國民政府監視以外，就是擔心引發華僑界的政治對立使之分裂。

冷戰時期起，陳舜臣開始撰寫大量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品。成名作《枯草之根》描寫神戶華僑及華人的生活，其內容充滿中國武術、中醫、中華料理、象棋等刺激日本讀者的「異國情調」且強化「東方主義」的要素。《鴉片戰爭》等部分中國歷史小說也將二十世紀以後民族國家的概念、框架投射到傳統中國社會。1972 年之前，陳舜臣從來沒拜訪過中國大陸，小說中的景物完全來自文獻資料和個人想像。透過人物形象的想像與創造，陳舜臣試圖在戰後幫助在日台灣人和他自己成為「中國人」，並使得大陸系華僑、華人繼續抱持「中國人」意識。

現在看來，給予在日台灣人「想像的共同體：中國」之形象的這個嘗試在台灣會被批判。然而，我們必須了解，此形象在日本華僑、華人、台灣人社會中，具有與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內部不同的脈絡。在日本社會中華僑、華人、台灣人是弱勢族群。可以說，陳舜臣希望弱勢族群能團結並順利生活於日本社會，因而透過創作活動創造超越共產黨系和國民黨系之間的

對立且包括兩岸的「中國」形象。他本人雖較為支持中共，有時也在作品裡發洩此心情，但他基本上不得不盡量迴避在華僑社會恐怕會引起兩岸政治對立的材料。

## 六、結語

以上是，1960-80年代陳舜臣創造的文學世界中之「台灣」問題。

陳舜臣以江戶川亂步獎得獎作《枯草之根》成名前，在台灣新莊接觸到二二八事件的消息。2003年出版《路半上》之前，他始終沒寫過此恐怖經驗及國民黨獨裁下的台灣，並且迴避此話題。當時日本華僑及華人社會圈，台灣系居民的數量和影響力相當大，但《枯草之根》中描寫的神戶華僑華人界中，完全沒有台灣及台灣人的痕跡。翌年發表的《憤怒的菩薩》雖然刻劃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微妙關係，卻仍然迴避直接提及二二八事件。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不少年輕知識份子走向左傾化——如同在日台灣人的社會傾向，冷戰時期的他較為支持中共，文化大革命時也發表了讚美新中國的文章。然而，在小說作品中，他基本上不寫國共對立的相關問題，也不直接批判台北政權，並且在《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殘絲之曲》、《桃花流水》這些歷史小說中，將台灣形塑為建立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不可欠缺的要素。對當時的陳舜臣而言，包含台灣的「中國」是超越政治對立、民族認同的對象。從現在看來，許多台灣民眾可能會批判此想法，但當時陳舜臣的想法似乎是，作為居住在日本的弱勢族群，華僑、華人必須迴避與兩岸相關的政治對立。

我認為，冷戰時期陳舜臣向日本一般讀者及在日華僑、華人、台灣人讀者展示中國形象的背景之一是，戰後在日本社會中盛行的所謂「第三世界」論述。1950年代後半以後，在萬隆會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之下，高度經濟成長中的日本有許多人認同此論述，堀田善衛、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作品中不乏試圖和亞洲、非洲人民合作的題目。《虹之舞台》（1973）這篇小說中，陳舜臣書寫主角陶展文同情印度獨立運動家錢德拉·鮑斯的一段文字：「他本來出生於被壓迫的國家，被為獨立而鬥爭的鮑斯之英姿感動了。」<sup>31</sup>

1960年代末以後由在日華僑主導的弱勢族群運動也可能鼓勵了陳舜臣。1970年前後，新左翼團體華僑青年鬥爭委員會（華青鬥）等在日華僑、韓國、朝鮮人團體開始展開反對日本入管行政的運動（「入管鬥爭」），批判戰後日本壓迫外國人的政策。運動進行期間，1969年4月，一個台灣籍大學生為抗議服毒自殺。一般而言，盛行於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的日

本左派運動中，反對日美安保條約、越南戰爭的運動以及沖繩返還運動較受重視。但近來評論家絳秀実、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等人十分重視此入管鬥爭，他們指出，入管鬥爭就是戰後日本的弱勢族群運動的濫觴。<sup>32</sup>

陳舜臣似乎和入管鬥爭、華青鬥沒有直接的關係，但陳舜臣在日本文壇上強調的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受了相關背景的影響。可以說，陳舜臣書寫那些尋求民族認同的在日華僑、台灣人主角，並給日本讀者介紹中國歷史形象，理由之一是，為了提昇作為弱勢族群的在日華僑、台灣人的地位。1960 年代初，陳舜臣早華青鬥一步開拓在日弱勢族群問題。華青鬥的成員華僑青年中，很可能有暢銷作家陳舜臣的愛讀者。在他們抗議日本主流社會之際，陳舜臣作品或許也支撐著他們的情緒。

陳舜臣文學當中，「台灣」始終扮演關鍵性角色。現代歷史上，目前為止，被日本殖民、二戰後成為冷戰前線基地等，台灣一直以來就得面對十分複雜的命運。他作為台灣系華僑在日本展開作家活動，此背景和經驗才能產生獨特的文學世界。

但我們必須說，陳舜臣文學有不少問題。稻畑耕一郎、曹志偉等始終讚美陳舜臣文學的研究者都忽略這些面向。例如，除了書寫大航海時代台灣的短篇小說《新港的青年》(1972)外，陳大部分的作品中欠缺台灣原住民的視角。而且，冷戰時期陳舜臣發表的讚美中共的言論，現在必須被批判。1970-1980 年代，他頻繁的前往中國大陸並撰寫紀行文，描寫文革末期中國社會的筆調卻毫無批判性，始終沉溺於古代浪漫，他的作品和發言加強日本社會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幻想。此外，他完全沒提到二二八事件和獨裁政治下的台灣、以及 1960 年代在日本展開的台灣獨立運動。

另外，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陳舜臣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取得日本國籍。仍保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他後來開始關心台灣，1990 年代以後，他協助司馬遼太郎撰寫《台灣紀行》，和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進行交流。因此，最近有人指出晚年陳舜臣的轉變代表將國家認同對象從大陸轉移到台灣，這同時也是不少在日台灣人之轉折。<sup>33</sup>然而，我認為晚年的陳舜臣並非只為了追究國家認同而關注台灣。因為，1990 年代以後，陳舜臣陸續撰寫《耶律楚材》、《成吉思汗的一族》、《桃源鄉》等關注跨越國家和民族而活躍著的歷史人物和民眾。此背景設定可說是，被荷蘭、清朝、日本、國民黨等政權統治過的台灣歷史的一種呈現，晚年陳舜臣根據台灣人的此段歷史經驗嘗試思考超越國家、民族的人類的普遍性。我十分關注以

克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為題目的這些作品，但因篇幅不容許，將另找機會詳細探討此問題。

(Sasanuma Toshiaki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 注

<sup>1</sup> 除了這兩個人的著作，其餘探討陳舜臣文學的論文如下：王向遠，〈源頭活水：日本當代歷史小說與中國歷史文化（第四章 得天獨厚的華裔作家、中國歷史小說的第一人陳舜臣）〉（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朱耀廷，〈評陳舜臣著《成吉思汗一族》〉，《歷史月刊》242（2008.03）李勇，〈日本歷史小說家陳舜臣與《三國演義》的“變奏”〉《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5期（2011.10）、陳建守，〈擺盪在嚴謹與詩意之間——讀陳舜臣《青山一髮》〉，《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7.09）、徐慧／劉紫英，〈從《秘本三國志》來看陳舜臣的民族觀〉，《讀與寫（教育教學刊）》第10卷第4期（2013）、徐慧，〈從《秘本三國志》來看陳舜臣的歷史小說創作理念〉，《山花》第24期（2014）、高雲，〈陳舜臣推理小說《玉嶺的歎息》中的儒雅文風〉，《環球市場信息導報》（2013）、晏山農，〈驚濤甲午凝思陳舜臣〉，《文訊》353（2015.03）、張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族——讀陳舜臣《成吉思汗一族》〉，《文訊》271（2008.05）、蔣豔，〈中國題材的日本歷史小說——陳舜臣《甲午戰爭》〉，《青年文學家》（2013）、若林踏，〈世界を見渡すための覗き穴、それが陳ミステリだ〉，《ハヤカワミステリマガジン》第60卷第4號（2015.05）、樋口大祐，〈多重所屬者の軌跡——陳舜臣の一九三〇年代小説と華人ディアスポラ〉，《一九三〇年代と接触空間》（東京：雙文社出版，2008）。但這些論文皆未提及戰後在日華僑及台灣人面臨的政治社會脈絡，也沒有探討陳舜臣文學中台灣佔有何種位置和意義。

<sup>2</sup> 曹志偉，〈陳舜臣的文學世界——獨步日本文壇的華裔作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頁72。

<sup>3</sup> 例如，松本清張《零的焦點》（1958）的犯人以前是戰災孤兒、為了養弟弟淪為以美兵為客的娼妓，後來為了隱蔽過去而犯罪殺人。橫溝正史《犬神家一族》（1951）中，出現因在海外戰場受傷經常戴面具的人物，他有資格繼承大富豪的遺產，但不少人懷疑面具下的真面目是別人假冒的。即便陳舜臣沒直接受到影響，但《枯草之根》的時代背景是與松本清張、橫溝正史等相類似的。

<sup>4</sup> 〈江戸川乱歩賞受賞の陳舜臣〉，《朝日新聞》（1961.08.06）。

<sup>5</sup> 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戰後日本神戶華僑社會的變遷〉，《臺灣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二期（2011）。

<sup>6</sup> 譚璐美、劉傑，〈新華僑 老華僑 變容する日本の中国人華僑〉（東京：文藝春秋，2008）頁201-211。

<sup>7</sup> 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台北：五南出版，2005）第三章。

<sup>8</sup> 陳舜臣，姚巧梅譯，〈枯草之根〉（台北：遠流，1996）頁252-256。

<sup>9</sup> 毛澤東，朱德，〈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1459-1461。

<sup>10</sup> 西村幸次郎，〈中國民族資本の保護育成と社會主義的改造〉，《比較法學》（1973.07）、張玉瑜，〈過渡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上海：學林出版社，2012）。

<sup>11</sup> 陳舜臣，〈割れる 陶展文の推理〉（東京：徳間文庫，1987）頁20。

<sup>12</sup> 陳舜臣，林琪禎、黃耀進譯，〈半路上〉（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頁237-238，-243。

<sup>13</sup> 同註7，第四章。

<sup>14</sup> 徐韻婷，〈陳舜臣における華僑像——『枯草の根』を中心に〉（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06）頁42. 58。

<sup>15</sup> 〈江戸川乱歩賞受賞の陳舜臣〉，《朝日新聞》（1961.08.06）。

<sup>16</sup> 陳舜臣，游若琪譯，〈憤怒的菩薩〉（台北：游擊文化，2016）頁226-227。

<sup>17</sup> 同註7，頁160。

<sup>18</sup> 同註，頁112。

<sup>19</sup> 稲畑耕一郎，〈境域を越えて 私の陳舜臣論ノート〉（東京：創元社，2007）頁180。

- <sup>20</sup>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出版，2008）頁 63-65。
- <sup>21</sup> 《中國鐵路創建百年史》（台北：中華民國慶祝中國鐵路一百年週年籌備委員會，1981）頁 1-16。
- <sup>22</sup> 陳舜臣，《桃花流水 陳舜臣全集 17》（東京：講談社，1987）頁 69。
- <sup>23</sup> 陳舜臣，卞立強譯，《鴉片戰爭 發端信號的引爆》（台北：五南，2015）頁 29。
- <sup>24</sup> 陳舜臣，卞立強譯，《鴉片戰爭 舊時代的崩潰》（台北：五南，2015）頁 284。
- <sup>25</sup> 陳舜臣，劉瑋譯，《日本人與中國人》（台北：博雅書屋，2012）頁 139。
- <sup>26</sup> 陳舜臣，〈南京の雑踏で考えた日本人と中国人〉，《中央公論》（1971.01）。
- <sup>27</sup> 陳舜臣，〈歴史を見る毛主席〉，《朝日ジャーナル》（1976.09）。
- <sup>28</sup> 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 神戸華僑と神阪中華會館の百年 増訂版》（東京：研文出版，2000）頁 1-2。
- <sup>29</sup> 同註 29，頁 253-254。
- <sup>30</sup> 張玉玲，《華僑文化の創出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中華学校・獅子舞・閩帝廟・歴史博物館》（東京：ユニテ，2008）頁 140, 142。
- <sup>31</sup> 陳舜臣，《枯草の根 三色の家 陳舜臣全集 21》（東京：講談社，1988）頁 378
- <sup>32</sup> 絳秀実，《1968年》（東京：ちくま新書，2006）、小熊英二，《1968 上下》（東京，新曜社，2009）。
- <sup>33</sup> 何義麟，《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台北：五南出版，2005，頁 13。